

39年前的稿费单

肖复兴

书柜越来越膨胀,越来越杂乱,逼迫我每年年底都要清理一两遍,却是越清理越乱。必须痛下决心,将陈年积下的书籍和杂物,毫不留情地处理掉,腾出一点儿清爽的空间,让心里和眼前都轩豁一点儿、干净一点儿。清理书柜的最下层时,忽然发现角落里很委屈地挤着一个小本,红塑料皮带拉链,由于年头久远,塑料皮已经硬化,拉链也坏了,拉不上,小本张开嘴巴,像是要说什么。

我不记得小本里记的都是些什么,打开一看,是当年满满的采访笔记。那时候,我热衷报告文学的采写,东奔西忙,随身带着的就是这个小本。一页页翻着,密密麻麻的小字,眨动着记忆残缺不全的影子。没有想到,中间有两页异样,爬满阿拉伯数字,像躲藏在林子里的一些小蘑菇,只不过已经枯萎——蓝墨水的字迹已经变淡。细看,居然是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。

我有些好奇,为什么单单是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呢?这以前和以后的稿费记录都没有,只剩下1983年形影单只地突兀在这里,像顽强地留在舞台上不愿意退场的角色或道具。悠长岁月里打下来的一道追光,斜长地照射在1983年那一个个单调枯燥的阿拉伯数字上。那些数字伸头探脑,像浮出时光之河的一尾尾已经干涸的小鱼,为那时的文人写作留下一枚枚发黄的标本。稿费,于文人是如老牛耕田,秋天谷穗收获一样的回报,对照39年之后的今天,虽然细微如蛇迹,却可以看出时代变迁的影子,留下一点点那时那清浅的回声。

记得我人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,是在1976年底或1977年初。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,我写了一篇怀念的散文,两千字,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的副刊上,得稿费6元。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刚刚恢复稿费制度之时,我在一所中学教书,每月的工资42元半,6元相当于工资的七分之一。稿费单是寄到学校里的,成为一大新闻,写稿居然还能够赚稿

费。那时,我和妻子两地分居,又和有病的老母相依为命,生活有些拮据,学校好心,每年春节前都要给我30元的生活补助。6元的稿费在学校传开,这一年的年底,校长找到我,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,毕业于西南联大,对我一直青睐有加。他望着我说:你有稿费了,老师们有议论,我们研究了一下,今年的补助就减少一半好吗?我连说应该的。送我出校长室的时候,他又笑着对我说:6元钱,稿费不高,还不如我们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候呢。6元的稿费,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,不仅由于是第一笔,更主要是老校长让我感动的亲切眼神和话语。

我从此写稿有了稿费,但具体都是多少,记不清了。如果不是看到笔记本上1983年的稿费记录,一切如烟而逝,被彻底遗忘。所以说,记忆是不可靠的,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总会变形,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删削或有人为的添加。而笔记本上稿费单的记录,是记忆真实无误的凭证。数字虽然冰冷枯燥,却也铁面无私,清爽如根根笔立的树木,让记忆一下有了枝叶摇曳的生命。

将这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抄录如下——

一月:《我们还年轻》394元,《绿色的戈壁滩》130元,《宋世雄,应该给他一枚金牌》110元,《二十岁的时候》160元,《爱》77元,《灯光》60元;
二月:《老人与海》92元,《风雪邮路》72元,《李富荣和别尔切克》194元;
三月:《抹不掉的声音》198元,《命运交响曲》154元,《相逢在春夜里》80元,《爸爸妈妈今天毕业》80元;
四月:《小院记事》100元,《那不该倒塌的》125元,《你为别人送去了什么》70元;
五月:《木牌牌》120元,《欢欣与苦恼》120元,《洁白的天鹅》70元;
六月:《瓜棚记》90元,《一片小树林》

146元;
七月:《魔方、飞碟和火》370元,《已经是秋天》70元;

八月:《她和他们》130元,《学院墙内外》370元,《柴达木传说》250元,《北大荒酒》166元;

九月:《西瓜的故事》85元,《爱就是火》95元,《默默的燃烧》75元;

十月:《鸟,又飞了回来》100元;

十一月:《爱矿灯的姑娘》45元;

十二月:《北大荒奇遇》315元,《美好而苦涩的心》150元,《一路平安》320元,《三月三》105元。

记录的这些篇目是1983年我写的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,发表在当时的《人民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月刊》《青春》《雨花》《新港》等杂志上,是我写作比较勤奋和兴奋的一年。那一年,是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头一年,正是我36岁的本命年。这一份记录,于我算是雪泥鸿爪的纪念,是那一年年轮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纹络。

其中好多文章写得潦草,记不清都是什么,只有重要的文章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比如《柴达木传说》,是经《文汇月刊》当时的编辑罗达成之手发表在当年第九期刊物上的。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,被几家报刊转载。两万四千多字,从稿费单看出,得稿费250元,当时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十元,基本上一万字的稿子,稿费100元,各杂志上下幅度不大,标准大致统一。

笔记本上还记着一笔,《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》的税后稿费2745元。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,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合集,由老编辑胡容大姐编辑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,二十多万字,首版印了八万册,算下来也是千字十元左右,书和报刊的稿费标准差别不大。这本书在1983年12月出版,收到样书和稿费是1984年的事情了。

如果不将这本书的稿费计算在内,

1983年我一年的稿费收入是5248元。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,这笔稿费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不算少(当然无法和畅销书作家相比)。当时流行“万元户”,1983年我的这5248元,等于半个“万元户”呢。

千字十元,相对刚刚恢复稿费的标准千字3元,6年的工夫,稿费标准增长三倍之多。如果和如今的稿费标准相比,增长幅度明显高出更多,一些报刊的稿费千字百元至几百元不等,有些杂志则高达千字千元。这样算来,稿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一百倍。这还不算版税拿稿费,会更多。只按照平均的标准看,和1983年比,如今的稿费最低也增长了十倍上下。应该说,稿费确实在增长,有目共睹。

但这只是数字的增长,没有物价指数的上涨和货币的贬值因素在内。物价指数和货币贬值率过于专业,说起来有些复杂,如果只拿当年的工资来和今日的工资对比,会看得稍微直接明了一些,便也会看出如今变化后稿费的些许尴尬。1983年,我每月的工资是47元5角,一年的总收入是570元。我的稿费收入是工资年收入的近十倍。现在,我年进账的稿费则远远达不到工资收入十倍的标准了。从这一点看,我们如今的稿费和1983年比并没有增加,相反减少。数字的变化,说明不了实质的变化。

当然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者,不能以偏概全,囊括其他作家,更不能和上了作家收入排行榜的作家相比。但是,作为一个普通作者,也许更具有普遍性。这个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,还是多少可以给制定稿费标准的部门提供一点点参考,调整制定出更合情合理、合乎时代发展的标准,从而更体现对作家劳动、对文化价值的尊重。对于一般人而言,或许和稿费并无关联,但这个1983年的稿费单记录,起码可以像一张老照片,让你想起39年前我们曾经共有的生活图景。蓦然回首,已是白云苍狗,数简信书忘世味,半瓯春茗过花时。

刘书毓

“像我们这样的人,难道不可以有一次机会,就一次,证明自己生来不是被人笑,被人欺负被人像烂泥一样踩在脚下!”为了这转瞬而逝的高光时刻,三个少年加一个落魄失意的中年男人,决定搏一把,毕竟人活着,也想为自己乏善可陈的一生加上些精彩注脚,哪怕,只有一次。

咸鱼翻身从来都是观众爱看的戏码,因而在影视剧中这也是再寻常不过的设定:废柴少年拜师学艺,终练得神功,一路斩妖除魔,最后称霸武林。故事往往在主角问鼎武林盟主后戛然而止,但《雄狮少年》不同,它以极为淡然的笔触,为我们揭示出一个事实:英雄光芒过后,照样要面对一地鸡毛。

这既是关于少年人追梦的故事,也是一场少年人盛大的成长仪式。

影片一开场,广东民谣乐队五条人的《道山靓仔》率先将观众带到岭南小镇,紧接着,头发杂乱似鸟窝、身形瘦弱如麻杆、无所事事骑着破单车游荡的“靓仔”阿娟出场。为了看望在广州务工的父母,留守少年阿娟做出重大决定——参加舞狮大赛,获得去广州的名额。于是他拉扯了两个小伙伴,准备学习舞狮。

但他们三个人的起步,实在太低了。阿娟幼时身体不好,父母为了好养活便取了个女孩的名字。父母在广州打工,瘦弱的阿娟从小同爷爷相依为命,他弯腰驼背、唯唯诺诺的样子,任谁都无法将其与冠军联系起来。

剩下的两个小伙伴比他还不如,一个游手好闲长相丑陋,另一个常常因为吃得多而遭人嫌弃,这样三个少年组成联盟去争夺舞狮大赛冠军,任谁看了都得叹口气。杂牌队伍还是拉扯着成立了,下一步便是找师傅,可深山古寺中并未有传说中避世不出的高手,只有一个记忆衰退的老头,在老头的指点下,三个孩子终于见到舞狮师傅——曾经的舞狮大赛冠军,如今送咸鱼的中年大叔阿强。

这三个孩子实在不像武侠小说中命定的救世主,不仅天赋太差,连友谊赛都败北,经过更刻苦的训练后,好不容易拿到了复赛资格,本以为是曙光初现,不料是暗夜来临前的最后一抹晚霞。阿娟的父亲在工地摔伤昏迷不醒,为了生活,阿娟的舞狮梦只能止步于此,少年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大巴,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中捡拾碎裂一地的梦想。

当梦想遭到现实的迎头痛击,孤傲少年该何去何从?

如果说留守儿童的成长仪式注定是悲怆、冷冽的,那么《雄狮少年》做的,便是在残酷生活中让少年保留着一小簇火焰,即使一小簇微光,也能在晦暗不明中照亮脚下的路。当阿娟被迫进入成人社会,辗转于各个工地之间,观众们看着他为生活疲于奔波,也善意地宽容了他放弃舞狮的决定。

但影片进入后半段,当疲惫的少年在天台戴着狮头,踩着心中的鼓点跳跃、腾挪,镜头扫过斑驳的墙壁,上面密密麻麻列着的是每天的训练计划,此时观众才恍然大悟,原来阿娟并未放弃舞狮!当阿娟重新戴上狮头争夺霸主的时候,他更强壮、更坚毅了。

因而当他决定跳“擎天柱”的时候,我们毫不怀疑,他会赢。而这也切合了影片那句台词:“人这辈子,就像舞狮,上山下山。”阿娟是否跳上擎天柱已经不再重要,欣慰的是他已经战胜了内心的恐惧,实现自我超越。

导演坦言,自己想做的是现实向影片,为了塑造主人公真实的生活场景,创作团队跑遍了广州周边各种村落,才找到最符合设想的百丈村与北水村。在影片中那些散落在鱼塘上的大小房屋,颇为典雅的祠堂与老宅,盛大节庆的舞狮,都极富生活气息,使观众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影片所营造的环境。

除了影像风格偏写实,《雄狮少年》的整体立意也是从现实出发,电影将其表达的少年成长的主题嵌套进传承文化的背景之中,以热爱与奋进贯穿,主人公最终翻过心中那座名为恐惧的高山,实现梦想。

若故事在这里结束,似乎同普通的逆天改命套路别无二致,但影片之所以叫《雄狮少年》,更重要的寓意在于,它唤醒了少年人内心沉睡的雄狮。不管日后如何艰难,阿娟始终会怀着坚定信念,去面对生活的诸多不完美。

阿娟褪去光环,重新背起行囊颠簸于打工的路上,方才的万众瞩目仿若他漫长人生中的黄粱一梦,但再次踏上征途的少年,已经是不再懦弱的阿娟。电影结尾有意把此前营造的梦击碎,将故事落到实处,让观众从热血逆袭的戏码中抽离。其实,我们何尝不是“阿娟”,整日碌碌奔波,想鼓起勇气搏斗一番,却不知被名为生活的绳索绊住了脚步。

少年不惧岁月长,彼方尚有荣光在,《雄狮少年》致敬了平凡却顶天立地的少年。“阿娟们”平凡生活中最壮烈的时刻,便是他们腾跃而起触摸梦想之时。这是一场花一现的精彩,会成为日后艰难生活中的慰藉。是的,虽翻山越岭,但过一山,便有一山的光彩。

用罗曼·罗兰那句名言形容影片再贴切不过: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家乡的隆冬

王军

家乡的冬天是很冷的,有时人站在迎风的村头上,会冻得双脚生疼生疼。记事起,每到隆冬,家乡的气温都是在零下摄氏三四度的样子,有时还低些。

可是,每当早晨的阳光从东边的山岭上喷薄而出,那七彩般的光芒透过薄如蝉翼的雾,照在乡野的丘上,虽然山是秃了些,却显得格外有情调,景色也分外迷人。有时,晨曦中的雾萦绕在乡间的枯草间,似炊烟升起,又像轻纱飘落,把这个冰冷的季节打扮得像出嫁的新娘。

偶尔,村旁那棵落光了叶的柿子树上,还有那么一两个红彤彤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树梢上。它像冬天里的招牌,在寒风冷冻的空气中,如同山区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,给人一种希望。

有时,几个喜鹊从山的那边飞了过来,落在柿子树上,叽叽喳喳瞅着柿子叫个没完。村头的一群麻雀听到后,也来凑热闹,急急忙忙地窜到树下的草地里,用爪子不停地翻弄着枯黄的树叶。

那边胆大的两个麻雀调皮得像个孩子,径直飞到一旁的牛背上蹦来蹦去。见有人来了,嗖的一声又飞了起来,惊动了地上那群觅食的麻雀。密集麻雀的麻雀,喧闹得像赶集的人群,瞬间飞得无影无踪。

田埂上,一位老大爷背着一捆稻草站在那里,瞅着满田绿油油的油茶,自言自语地念着:“年景几不坏,过春儿能打出香喷喷的油来。”说完,他把稻草放在牛的跟前,叱咤地叫了两声,见牛晒在冬日的阳光里,便回头去了自家的菜地。

家乡在大别山的腹地里,是红色的血脉耕植的土地。

走在山上,远处一块块墨绿的树带,那是雪压不倒的青松,也是红军烈士的灵魂,至今屹立在群山中,慰藉着后人的心

灵。那红红不落的树叶,那黄灿灿的银杏,那绿绿的油茶,杂织在林中,植耸在河旁,幸福得像花儿一样,似乎不知隆冬的到来。

有时,我站在北方寒冬刺骨的天里,遥望着家乡,想着那里的叶红如霞、鸟鸣如歌的画面,心里总是溢出些美滋滋的感觉,也总是泛起难以抹去的念想。于是,便不时地思忖着,趁不忙的时候,回趟家乡,看看那里的树叶,那里冬日的暖阳,一手啃着甘蔗,一手提着水库刚打来的鲤鱼,望着湾头那个炸爆米花的乡里人,瞅着屋檐下晶莹的冰掉儿,像是年来了……

那个季节,在河南新县的土壤里。那里不光有红色的故事,红色的足迹,更有脱贫攻坚的新时代传奇。

因为那里是老区,有红色的精神;因为那里里是有梦想的地方,有九镇十八湾的美丽。

千年古道状元岭

缪淑秀

秋日的午后,踏着湿润的阳光,邀一博学多才的文友,登上位于福州城北一隅的状元岭。

古时,福州府学风蔚然。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曾在诗中写道:“路逢十客九青衿,半是同袍旧弟兄。最忆市桥灯火静,巷南巷北读书声。”书声琅琅,墨香幽幽。

福州,简称榕,别称“三山”“左海”“冶城”,为福建省省会,又称“闽都”,是个依山傍海的古城,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,建城时间可追溯到战国晚期。历史上,中原人口七次入闽,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三次,分别为:战国时期,越王无疆后裔带领族人来到福州,与闽族融合,形成闽越族,在福州修筑城池;两晋南北朝时期,中原战乱,晋元帝渡江,建都建业(今江苏南京),中原士族相随南逃,史称“衣冠南渡”,永嘉二年(308年)起,大规模南迁入闽;五代十国时期,王审知兄弟随唐末农民起义部队从河南固始一路南下,进入福建,之后以福州为中心建立闽国。这些入闽者大部分定居在福州地区,也奠定了福州在福建的政治、文化中心地位。

北宋嘉祐八年(1063年),年仅26岁的许将摘得癸卯科状元,成为历史上福州首位状元。自南宋乾道二年至八年(1166—1172年),福州属县永福(今永泰县)萧国梁、郑侨、黄定三人连续三届夺魁,以“一县七里三状元”打破科举史记录。南宋宁宗嘉定元年(1208年),状元郑衍之、榜眼孙德舆、探花黄桂全是福州人,被誉为“一榜三鼎甲”。更为稀奇的是,明永乐十年(1412年)状元马铎和永乐十六年(1418年)状元李骐都是福州长乐人,为同母异父兄弟。最让福州人深感自豪的是,26位状元皆是忠良,未曾出过一个奸臣。

八闽大地山高岭峻,沟壑纵横,猛兽出没。古道之凶险,让出行举步维艰,但闽都先人跋山涉水,风雨兼程,翻越大山,从这条古道走出福州,走出福建,走出中国,走遍历史。

开放包容的文化土壤培育了福州人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胸怀,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福祸避趋之”的家国情怀。他们胸

膺,起视饭满几。磊磊行客过,安得独停轨……”有多少人考取功名,又有多少人丧生途中;有多少人荣归故里,又有多少人客死他乡?但他们依然前赴后继。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。”千百年来,闽都淳厚的文脉基因在这条古道上代代传承。

千百年的风疏雨骤,古道见证了多少闽都学子的壮志与离愁。古道沿线建有三山觉路、樊公亭、文昌阁三个休息亭,在半途一视野开阔处极目远眺,五虎山、鼓山、旗山、莲花峰将城区揽入怀中,屏山、乌山、于山三山尽收眼底。相传,清嘉庆十六年(1811年),26岁的林则徐第三次进京赶考,行至此处,回头再望一眼渐行渐远的故乡,心中漾满了背井离乡的惆怅。此次,林则徐终于以殿试第二甲第四名的成绩被选为庶吉士,授翰林编修,从此踏上报国之路。林则徐谥号“文忠”,此处被后人命名为“文忠望乡”,纪念这位从状元岭走出的民族英雄。

如今,八闽大地路网四通八达,古道也完成了历史使命,静静地隐没在山林深处。1998年2月,大北岭古驿道被晋安区人民政府确定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。经数次修复,现已成为市民登山健身的好去处,沿途附属健身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,并命名为状元岭,为福建省现存最古老的古道。

深秋的阳光透过树梢,洒在静谧而清幽的古道上,星星点点,如一代代名儒志士留下的华美诗行。